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十一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335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十一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十一辑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

(昆明市环城北路)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代售

一九八二年九月出版

〔内部发行〕

云南省书刊出版登记证云出字第 079 号

定价：四角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十一辑目录

- 一、一九二七年石屏建党初期的斗争……杨东明 (1)
- 二、一九三五年云南建党的经过……费 炳 (5)
- 三、我为什么到延安……吴 森 (11)
- 四、回忆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
……袁永熙讲述 蒋中礼整理 (24)
- 五、解放前宣威县的人民政权……杨泓光 (43)
- 六、回忆滇东北军政干部学校……杨 慵 (49)
- 七、元江阻击战回忆……钱渭川 (56)
- 八、夺取金沙江渡口……张炳今 (62)
- 九、安宁赖武包山和玉溪草皮山两次战斗
……马万选 (69)
- 十、参加边纵卫生工作的回忆……玉侨俊 (76)
- 十一、红电台……王 斌 (81)
- 十二、编者的话
- 附：几封读者来信摘登……潘光宗等 (86)
- 本刊第十辑勘误表…… (99)
- 本刊第十二辑要目预告…… (55)

一九二七年

石屏建党初期的斗争

杨东明

石屏，号称“文献名邦”。文人学士，代有前人。但封建势力，比较顽强，新思想、新文化，受其嫉视和排斥。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继之是“五卅”的工人运动，仍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冲击着旧的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文化。许多进步青年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迪，掀起了自觉学习的热潮。

一九二七年，昆明私立成德中学的一个名叫张春旭（笔名不挠，1930年被捕，发神经病获释，现已死）的学生，他在昆明已被中共地下党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员。他假期回家，党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在石屏发展党的组织。他回家之后，与地方进步青年，打成一片。在思想交流中形成志同道合向往共产主义事业的共同愿望。经他介绍和云南地下党省工委批准，先后接收了张崇富（如一）、梁如英（国雋）、宋贞和（方）、李艺六、

杨东明(何英)为第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

建党以后，首先是开展思想工作，宣传马列主义，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在卖米巷开了个“东明书店”，把当时全国发行的《中国青年》、《响导》、《新青年》和昆明出版的《滇潮》等刊物，通过书店出售，广为传播。也附带贩卖学校需要的教科书、教授法和文具用品等。其次，结合当时“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成立“天足促进会”，在青年男女中，流行着反对妇女缠足的歌声，到处洋溢着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闹得一时轰轰烈烈，热气腾腾。苏宝鼎在昆明高等师范入党后，回石屏中学任教。党在中学和小学教员中，又吸收了翟光熙、吴纯介、谢海晏、薛光清、余澄清和老同盟会会员高铁峰（高岩）等入党。地下党的组织，在逐步壮大起来。

在昆明，蒋介石先后派来了他训练的鹰犬、党棍、特务如裴存藩、陈玉科、曾三省等回云南，改组了国民党的省党部，把龙云封为主任委员。在马市口国民党省党部门前的照壁上，大书“党权高于一切”的标语；发行了《云南民国日报》，作为他们的宣传喉舌，操纵舆论的工具。同时，还派员到各地区、县，去发展国民党的反动组织。

反动的国民党派到石屏去登记、发展组织的是：杨堂燕（子知）、丁尔谦两人。他们一到石屏，不可避免地，中共地下党就与他们发生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共地下党，号召地方人士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登记。城墙门上、街头、学校里，都张贴传单，暴露、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罪恶事实。国民党的特派员杨堂燕、丁尔谦等，纠集石屏反动军警，把“打倒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彻底肃清共产党”的大标语，直接贴到中学校和“东明书店”的门上去。顿时，掀起了一片白色恐怖，黑云压住僻静的石屏城。

又过了一年，土匪蜂起，石屏的土匪头目彭万有，与建水的杨有堂、曲溪的吴学显、个旧的莫朴等，联成一气，扰乱村寨，杀人越货，弄得人人自危。于是，石屏城里的地主豪绅，为了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成立了一个“成城社”，购置枪枝弹药，从事操练。还在城墙上修筑碉堡。每天每夜，按居住户口，轮流去守卫。夜里也要张灯巡逻，不使土匪偷越入城。

宝秀的乡绅，也在天君殿里，建立了“联合团”，推举陈鹤亭（陈钧）的四弟陈四阎王（陈美之）做团总。武装乡团，随时处于戒备状态。还向各乡各寨，摊派钱粮，作他们的供应。一次，在“联合团”召开的会议上，中共地下党员余澄清，他本来是许刘营的小学教员，被他们村里派去出席。会议是筹措团队供应，讨论钱粮分担数目。他在会上，起来仗义执言，为乡民请命。他说，各乡各寨，连年被兵匪骚扰，负担太重，不堪其苦，要求减免。会上，有人支持他的意见。为

了联合团的摊派，议论纷纷。阻碍了当事人，没有达到要求目的。因此，触怒了陈四阎王。会后两日，他就派了六个团丁，持枪由宝秀街向许刘营来找余澄清。余澄清正在学校讲台上向学生讲课。团丁们一瞥见他，就拥到教室里，开枪向余澄清射击。余登时饮弹倒地而死。鲜红的血，喷流在教室里。学生吓得哭喊连天，眼看他们的老师，倒在血泊中。四阎王派去的凶手们杀人以后，持枪折回团部，向四阎王去报功请赏。村里的乡老、学生和余澄清的家属，都知道凶手是四阎王派来的，不敢声张，只好默默的掩埋了余澄清同志的尸体，让生者无限哀伤，死者含恨九泉！

余澄清同志，为了抗议以陈四阎王为代表的地主豪绅们征收人民的钱粮，以至死于屠夫们的枪下。他是中共地下党的忠诚战士，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于今五十年了。缅怀先烈，令人敬佩，当时地下党的刊物《斗争》曾有悼念他的文章，他的精神永不磨灭。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日）

一九三五年云南建党的经过

费 炳

一、云南党遭破坏后我找党的情况

我是一九二八年在云南昭通参加共产党，做学运、农运工作，一九三〇年经组织同意，投考到国民党军校武汉军分校，组织关系仍在云南。我在武汉军分校秘密地做党的群众工作，主要是在川、滇、黔同学中物色一些对国民党现实有不满情绪的青年，组织秘密读书会，吸引他们靠拢党。在一九三一年得知云南党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我便失去了组织关系。为了继续开展党的工作，我就积极设法找党。在武汉没有找到党。在武汉军分校一年入伍期满后，于一九三一年底并入南京本校。

一九三二年在南京，发现有世界语学会的组织，因我曾看过胡愈之所写《莫斯科印象记》中谈到他到莫斯科时，得到当地世界语者的热烈欢迎。我想中国世界语者中，可能会有党的关系。

这时，我们秘密读书会的成员吴懋德（四川渠县

人)也积极要求找共产党干革命,我们相处一年多,知之愈深,相互愈信任,于是我就约着他去参加世界语学会,借读世界语为找党的线索。经过一段时间,接触的人不多,无法找到。听说他有四川家乡的同学在上海,卅二年暑假,我和他商量并把我在南京伪军校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一些钱(云南政府每人每月发给四元补助费),给他做旅费去上海找党的关系。他到上海不久来信,果然找到了“朋友”(即党的线索)。以后他就未回军校,我们有通信联系。一九三三年暑假,我约着和吴懋德一样要求找共产党的读书会成员陈熙到上海,目的有两个:一是参加党组织;二是商量研究三三年底读书会成员毕业后怎么办的问题。谁知到上海按地址去找,却未找到,只有返回南京。不久,吴又来信说:他搬了家并害了一场病(后来才知他在同乡处被捕,因没找到任何证据才释放)。

一九三三年底在军校毕业前,吴懋德的消息再次中断(以后知道他又被捕),就在这时发生陈熙失踪的事,这件事使我至今仍耿耿于怀!

陈熙、吴懋德和我在读书会成员中关系比较密切,吴到上海找党的事,我曾和他谈过。这次又失去联系,他思想上感到失望、苦闷,在睡梦中还为这事哭醒过。因他要求参加革命的心情急迫,一天,有个同学开玩笑哄我,说我有信,他很高兴以为是吴的信来了。而实际我却未收到任何人的信,他怀疑我不信

任他，不相信他。在一个星期天，他约我陪他上街买东西（买了个钢笔尖），后来又到了郊外。他背着我突然用钢笔尖划破指尖，在纸上用血写下了“炳师：我坚决要求参加共产党，请你介绍我。学生陈熙”。我一看心里很难过，很快把纸条吞下去，对他说：你要求参加共产党，也是我的希望，但吴懋德的消息又断了，只好暂时耐心等待一下。在回校的路上，陈熙接着说，那末你介绍我去苏区。我说，我不知道苏区的人，他一言不发。过了两天和他同队（第五队）的读书会成员蔡明章下晚自习时跑来告诉我说：陈熙不见了。我们读书会的成员连夜在校内找不到，第二天我和朱嘉弼（后来改朱家璧）等云南同乡又到外面各处去找了一天，朱家璧还电话通知了司法机关，一直未找到下落。是否去苏区至今没有消息。这件事使我长期深感内疚，悔恨我当时工作没有做好，失去了这样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友，对不起党。

在即将毕业而吴懋德又失去联系后，怎样继续党的工作？想来想去只有回云南，若云南党组织已经恢复即参加工作，否则进行重新建党。当时云南政府需要一些云南同学回滇工作，龙泽汇来征求意见时，我即报了名，随即和龙泽汇、朱家璧等十八个同学回到云南。

我们读书会的同学，通过三年来的各种活动，靠拢共产党的思想各有深浅，河南的褚少甫到方振武的抗日部队，其他几个也各奔东西到有关系的部队去

了。最初一段时间，我们还有些联系，以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在军校三年的时间里，我仅只为党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但对个人来说收获还是大的，继续革命的立场和阶级觉悟以及对事物的认识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和提高，为云南第二次建党打下了思想基础；并通过吴懋德找到了党的联系，创造了云南第二次建党的组织条件。

二、一九三五年云南建党的经过

我们军校毕业回云南的十八个同学，都分配在昆明龙云办的教导团(其前身是讲武堂)工作。我了解到云南党组织自一九三〇年底遭受破坏，组织活动停止后还未曾恢复。过去参加过党的人，有的转移到省外，有的转移到外县，有的态度消沉，甚至有的背叛革命，投靠敌人，在国民党党部去效劳。要依靠旧有的人恢复云南党组织，事实上已不可能。同时彭祖祐等几个叛党分子，还在伪党、政机关身居要职。为了防止叛徒的注意，也不便在旧有的人中进行工作，只有设法重新建党。

要重新建党，首先必须在群众中物色一些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吸引他们靠拢党。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我决定按老办法在我所在的教导团周围群众中“交朋友”，同时，又参加了云南世界语学会，以扩

大接触群众的范围，继续进行工作。

在南京时，朱家璧见我学世界语，谈起学世界语的作用后，他即买了世界语读本来，我们共同学习过。在教导团时，我们每天早上仍抽出一段时间读世界语。那时昆明有张镜秋办的云南世界语学会，开办世界语班，并定期在报上出版《云南世界语周刊》。我约朱一同去参加世界语学会，当时各人都打算物色一些青年在自己周围（当时从我个人和他的接触观察，他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由于学会领导人张镜秋与张本元之间有矛盾，不能合作，以致影响会务。我们几经调解未成。经过协商，他们名誉上仍是学会领导，继续领取云南政府发给的津贴，张镜秋兼教书，朱和我负责会务，朱管教务，我管行政事务。

在世界语学会中，遇见热心世界语的李剑秋和李尚彬。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李剑秋还是我昭通中学时师范班的同学。在多次接触后，了解他们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现状不满。只要有空，我就约李尚彬到李剑秋住处聚会，读世界语、看进步书刊和交谈时事。在时代的熏陶影响下，他们都有参加革命的愿望，并且各人身边又联系有一些群众，我感到很高兴。

一九三五年初，过去到上海找党并和我失去联系的吴懋德（这时他已改名李浩然，党内化名水天），得知我已回云南在教导团工作，又来信和我联系上。在通信中我用隐语谈到我已结交了一些朋友，准备开店

的话。不久，李浩然回信说：他要办一批货来昆。我认为他是有任务来的，就事先和李剑秋商量好，李浩然来时和他同住（景虹街磨盘山一家礼堂楼上）。九月间李浩然到昆，我即正式联系上党的组织关系。我们互相交谈了别后的情况，他知道我已着手准备建党的工作，告诉我他这次来昆是中共中央军委驻上海的机关（后来才知是白区工作的党组织）派来的。他说：组织上最初拟派他到广西搞武装斗争，经他将我过去和他的关系及现在在云南的情况向组织汇报后，组织考虑先来云南会同我建立一些党的关系和搜集一些情报，然后再去广西，对工作是有利的。我们交换了意见后，随即开展了第二次建党的工作。我首先介绍李剑秋、李尚彬、李立贤（陈方）入了党。再利用各人的关系发展组织。随着李浩然将情况向上海组织汇报后，上海组织指示李浩然在云南扎根，不用再去广西。并同意于十二月组成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李浩然任书记，我和李剑秋、李立贤为委员，分管组织（兼军运）、宣传、教育等工作，李尚彬专搞世界语活动。

我们吸取了第一次建党时期，同志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好的经验，也吸取了建党初期缺乏斗争经验受到敌人残酷镇压的惨痛教训，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无到有，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地、稳妥地、信心百倍地逐渐开展了我们的工作。

我为什么到延安

吴 森

我的家乡在云南省弥勒县虹溪镇，四面环山，连个出水口也没有，交通极不方便，离家走二三十里就算是出远门了。在一个比较开明、很有权势的绅士倡议下，将一部分学租（供办教育的学田出租所收的地租）和庙租（香火租）作为建校经费，把规模相当宏伟、庄严，用以强固人们精神枷锁的孔庙，改建并逐步扩建为一所四年制的师范学校。那时连县城都没有中学，全县只有这一所师范学校。

在创办师范学校以前，因上千土匪围攻虹溪镇，我逃到朋普姨妈家。封建的社会经济正在崩溃，反动的地主阶级统治正在瓦解，抢劫盛行，社会极不安定。大的土匪头子叫“大老板”，横跨数县，能调动几千、甚至上万人；“小老板”能调动几百、上千人。这都是有名声的。十来八个在一起的散匪，分布较广，时隐时现，有的是在地里劳动，把枪隐蔽起来，见有财可发，就互相串连拿起枪，进行抢劫。真是土匪遍地。

当然，其中也有绿林豪侠。夜间打家劫舍，时常发生，我家就曾被抢过两次。睡觉都是提心吊胆，家家养狗，晚上听狗咬就要起床看动静。白天拦路抢劫亦是常事。为了防匪，民间私枪很多，象驮运货物的马帮都有武装护卫，来往行人亦多跟上马帮走。地方民团也是明团暗匪，他们或与土匪暗中勾结，或者如虹溪镇每隔四天赶一次大集，民团人员在集上游转，看到农村人谁卖的钱多，就派人盯上，一部分人装成土匪，在城外方便处就进行抢劫，他们对情况了解的很清楚。国民党的官兵比土匪还坏，老百姓把官兵比做篦子，把土匪比做木梳。土地财产稍多的人家就抽大烟、耍赌博，真是腐败、黑暗的社会。

我听说成立师范学校，就由姨母家回来上学。这已经是第二学期了。我边学新课，边很快补学完上学期的课，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惊讶。大概是在第三学期，由昆明来了两个小学女教师。一个姓姜，是我们家乡人，从小随父在外；一个姓宋。因为昆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她俩才逃到这里。她俩带来了许多进步书籍。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新文化，才由她们传到这个偏僻的山镇。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创了一种新风尚。女子学校办起来了，唱歌跳舞时兴了，反对裹小脚，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提倡男女自由平等，开始向几千年来禁锢着人们的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挑战

了。这两个女教师的生活，就是一种新的方式，男女青年一块相处，无拘无束，姜老师穿的是男装；据说，宋老师曾坚决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我和几个同学，在礼拜六晚上、礼拜天就常到她们那里看书，谈论一些问题。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揭露了人吃人的封建制度，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翻译的美国小说《石炭王》，都揭开了一种新的生活，充满战斗精神。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还常讲一些江西红军的故事，神出鬼没，无所不能，常打胜仗，有时白军的军长，突然就被红军给抓走了。还教唱革命歌曲，如“准备暴动要齐心，告我工农兵……”，有一次还来了一个叫马昆的，他讲的红军故事就更多了。给我们教国文的冯老师，有一次也讲到共产党员在就义时还气昂昂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我废寝忘食，全神贯注地抓着新书看。真理吸引了我，它揭露批判了我从小接触过的旧社会。

我在师范学校毕业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要离家到昆明。母亲坚决不让我走。我是个独儿子，生下一、两个月，父亲就死了，母亲二十来岁孀居，辛苦勤劳，费了多少心血，忍受了多少辛酸才把我抚养成人。母子相依为命，她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母亲说：“你走了，我就活不成了。”我说：